

張志岳 著

中國文學史論集



张志岳 著

中国文学史论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责任编辑：王滋源

封面题签：缪 钊

中国文学史论集

Zhongguó Wénxué shǐ lùn jí

张志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 4/16·插页 1·字计 246,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6,800

统一书号：10093·635

定价：1.95 元

目 录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讽谏文学和叛逆文学

两个传统问题的初步探讨	1
试论古代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衰替与	
文学语言发展变化的关系	16
赋比兴本义说——兼论赋体的发展	39
略论有关先秦散文的几个问题	50
文学上的庄子	63
试论屈原政治思想的来源	81
试论关于《楚辞》的两个问题	96
汉赋新诠	109
阶级斗争推动文学发展的史实考察一例	
——试论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歌和唐代文人	
诗歌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上的重要区别	125
鲍照及其诗新探	140
《文心雕龙·辨骚篇》发微	155
试论关于杜甫的评价问题	171
略论杜甫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191
论宋诗	207
关于《水浒》若干问题的看法	225
关汉卿及其杂剧的新评价	242
关于《红楼梦》若干问题的探讨	259
略论《红楼梦》诗词的评价问题	288
从龚自珍的调首绝句谈对他思想的评价问题	300
附录：谈谈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些问题	308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 讽谕文学和叛逆文学两 个传统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

自从出现阶级斗争以后，由于残酷的劳动分工，文学事业都掌握在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中有抱负、有眼光的作家，从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针对当时社会上，特别是政治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感受和对策，用文艺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这种感受和对策，是针对着当时统治者某些腐朽现象的，就直接起着揭发、控诉的作用；而作者所寄予的同情，必然要落在广大的被统治阶层，特别是劳动人民的身上。就作者的揭发和控诉来说，并不是要把当时统治者的政权搞垮；而正是关心统治者的政治危机，冒着触犯权贵的风险，尖锐而深刻地提出问题，衷心希望统治者能够对存在的问题有所调整和改革，以确保政权的巩固。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统治者对这点也有所了解，有时还鼓励官僚这样做。即令提的意见不被采纳，也能够察谅解提意见者的忠心，而不至加罪。因此，这种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现实的方式，逐渐形成一个好的传统，这从它的发生、发展来考察，是符合实际的，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这个好的传统，我们可以采

用白居易“讽谕诗”的名称，叫它作“讽谕文学”。

另一个文学好传统是“叛逆文学”。不少论者在评价古代的作家、作品时，常常用“封建叛逆者”、“叛逆思想”、“叛逆精神”等的字样来称呼或描绘，但似乎没有人作过系统的论述，对“叛逆”的解释还不可能取得明确的一致。本文所用的“叛逆文学”的涵义是指封建时代的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和当时统治者的现实政教持有显明的对立态度，但作者并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来作为指导，看不到新的出路，只有批判而没有明确的肯定，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这一好的文学传统是怎样发生、发展起来的呢？如所周知，封建地主阶级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马上就暴露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再加上君主个人的好坏不平衡，即使在上升时期，也经常会因为暴君或权臣而造成一段时间的格外黑暗。属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遭到暴君或权臣迫害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有所反抗便成为“封建叛逆者”这类人物。他们恨的是当时现实的统治者，反对当时现实统治者的政教；但并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只是通过某些幻想来追求自由与解放，实际上仍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框框。尽管他们反对现实统治的政教，只是出于反对当时现实统治者的一种愤慨，但从客观上看，毕竟接触到反封建制度的问题。他们幻想的种种自由，虽然都不切合实际，毕竟表达了要冲破封建束缚的意志。这种“叛逆文学”当然不可能得到公开的提倡，而且经常遭受压制和歪曲；但在封建统治下所制造出来的叛逆作家越来越多，他们的思想和前一辈的叛逆作品如针芥的相互吸引，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也就很自然地逐渐形成另一个好的传统。

根据我的考察与体会，这两种好的文学传统，都出现得比较早，孟子和庄子就分别是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们的作品都为这两种传统提供了榜样，给后世作者以深远的影响。

(二)

关于孟子的问题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他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把孟子作为奴隶主复辟的鼓吹者来看待。孟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似乎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照我看来，孟子是在他同时期内学者中较早地明确提出大一统设想的人，而且把这个设想的实现，寄托在当时的封建主特别是像齐宣王这样人物的身上。孟子的政治学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服务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一方面是现实的产物。在当时各封建主互相兼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残酷战争下，人民遭受的苦难是不难想见的。孟子发表了关于“民贵君轻”等一系列的爱民主张，就其民主性来说，当时谁也不能和他相比。尽管在今天看起来，这种民主性的实质是带有欺骗性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衡量，对人民是有利的，也是进步的。孟子仁政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这里面也吸收了奴隶主的某些有益的因素而加以改造，这是因为地主政权和奴隶主政权同属剥削阶级，本有可以相通的一面。在“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风气中，尽管孟子被许多封建主看作“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人，而不能重用他；但他为大一统的封建主所设计的一套统治原则，在汉王朝接受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以后，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汉王朝基本上采取了儒法合流的路线，吸收了孟子学说中的主要精神。这就说明，孟子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孟子发挥了他在文学上的创作才能，留下了许多具有自己鲜明风格的优美散文。不仅是标志当时散文

发展的丰碑，也为“讽谏文学”的传统开创了道路。例如《寡人愿安承教》章：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一段文字用的是当时对话的记录体，在问答中，孟子通过比喻的陪衬作用，使问题层层深入，一气贯注，凌厉无前。在仅仅一百多字的短文中，鲜明地体现了孟子那种为民请命，敢于尖锐地批评国君的刚直精神；同时，梁惠王那种处于被动的窘态，也隐约可见。孟子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一方面也确实是为国君的统治巩固着想，再加上孟子处于宾、师的客卿地位，国君虽然不欢喜他的态度，但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他。后人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都是传诵古今的名句，很显然都是从孟子这一段文字脱化出来的。以语气而论，却还都赶不上孟子的凌厉。又如《汤放桀·武王伐纣》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臣弑其君可乎？”在封建时代的君臣观念中，这个问题无疑是问得很尖锐而难以回答的。但孟子却以仁义为准则，把纣作为“君”的资格完全加以否定，然后认为杀纣只是杀一个坏人，根本不能

算是“弑君”。这几十个字的对话，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说得理直气壮，等于给封建统治者以当头棒喝，这是要有足够的胆气的。

孟子书中类此的章节还有很多，但通过以上两章的分析，对孟子散文的独特风格，及其给封建时代讽谕文学的传统以奠基性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孟子散文风格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气势的力量上，已为古今评论家所公认。之所以如此，固然与他善于辩论和善于运用比喻，驱使语气有密切的关联，但更重要的是与他仁政思想的基础分不开。用孟子书中的话来说，就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概括起来，就是理直则气壮的意思。正因为孟子自信其所说的道理，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诚心，所以说起来才有气势有力量，的确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后人向孟子散文学习的大家，同时也对孟子的人格表示崇敬，韩愈和王安石就都是如此。

讽谕性的散文是体现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又是为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他的散文的讽谕性显然是就当时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使统治者有所认识，有所警惕，进而更加振作，来改进自己的统治方式，以达到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目的。孟子所树立的榜样，正符合于后代封建社会有抱负的作家所要走的道路，他们自然很容易接受孟子的影响。这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有的统治者还能够接受意见，改进措施，从而收得一定的效果，也就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进步的作用。而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封建思想所能容纳得了的民主性，也必然会在这一文学的优良传统中有所提高。尽管历史是曲折的，但基本倾向总是如此，如唐代的优秀诗文，在这一点上比两晋南北朝就有着较显著的进展（参阅拙作《阶级斗争推动文学发展的史实一例——魏晋南北朝文人诗歌和唐代文人诗歌在

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上的重大区别》一文，刊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自孟子以来的“讽谏文学”传统存在着一个不可克服的弱点，这就是通过讽谏，把他们认为需要调整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身上。从封建制度来说，不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穷”和“达”的命运，只能由统治者掌握。因此，到了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讽谏文学”的道路就越来越窄，而终于走不通了。这是因为这时候封建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多，而统治者却越来越虚弱，振作不起来，谈不上调整和改革，你就是多方讽谏，也是毫无作用。不仅如此，统治者既然振作不起来，没有能力去调整改革，他就越怕你提出问题，怕你不怀好意，触犯他的尊严，动摇他的统治。这样，统治者就必然要在思想上严加控制，文字狱虽然由来已久，但越到后来就越变本加厉，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还是以孟子为例来说明一下吧！孟子在封建社会上升期间，他的历史地位也是逐步上升，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崇敬的，这自然是统治者要利用孟子来装点门面，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到了后来，居然出现过这样的事：

帝（指朱元璋）尝览《孟子》，至“土芥”、“寇讎”语（见《君之视臣如手足》章：全句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明史·钱唐传》）

这虽然只是统治者一时情不自禁的愤怒，到后来还是想到要利用孟子来装点门面，但已经很足以说明问题。历史上的孟子尚且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谁还敢讲话呢？清人龚自珍在他的《己亥杂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以说把

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期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如实地概括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讽谕文学”的传统既不可能从封建思想本身的发展吸取营养，再加上传统诗文的文言形式已越来越和发展了的语言脱节，难以广泛承担反映新时代的任务（参阅拙作《论宋诗》一文，见《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讽谕文学”也就每况愈下，不可能再作出新的成绩来了。

（三）

庄子的问题比孟子更为复杂。一般论者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消极的，代表了奴隶主的没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的文学散文也就被认为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庄子》这部书比较混杂，不太容易区别何者可以代表庄子，何者不宜代表庄子。我在《文学上的庄子》一文中，曾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而比较强调文学部分适当的独立性。现在结合本文的需要，再作一些简单的论述。

据我的考察，庄子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不是为了说理，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受，因此，他的散文比其它诸子更富于文学意味。又因为他走的是愤世嫉俗的叛逆道路，他的散文中表现这方面的思想感情的，也就更多一些，更突出一些。例如：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悦）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间陋巷，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晤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痔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耶？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见《列御寇》篇）

这很显然不是为了说理，而只是为了讽刺曹商；并通过对曹商的讽刺，来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高度愤慨。语言形象而又极其辛辣，给读者联想的余地是很多的。又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撒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饿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向子之谈者似辩士，诸（都）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神，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间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瞑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见《至乐篇》）

这也很显然不是为了说明齐死生的道理，也不可能用来说明齐死生的道理。而是通过髑髅的对话提出了生不如死这一命题，表达出对现实黑暗的极端愤慨。这种向往着无君无臣，追求自由解放的幻想，据我所知，在文学作品中应以庄子为第一人，而这也正是他的叛逆思想的体现。问题在于，庄子处在封建社会出现的初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叛逆思想？这从上文我们谈孟子的问题时，对战国时代的情况所作的分析，基本上也可以得到解释；但庄子与孟子约略同时，为什么孟子表现为对封建的大一统事业积极地出谋划策，而庄子却表现为对当时现实的深恶痛绝，只有否定呢？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根据我初步考察和理解：孟子是当时的儒学大师，而儒学又是当时的显学，因此，孟子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

传食于诸侯”，这说明当时的封建主虽不能重用孟子，但都对他表示尊敬，待以宾、师之礼。从孟子的遭遇来说，他之所以积极为封建主的大一统出谋划策，符合他的身份和思想实际。庄子的遭遇则不是这样。庄子是宋国人，经历过宋偃王的时代。据一些零碎的记载，宋偃王是个暴君。他锐意兼并，起初比较顺利地扩展了势力，就越发骄横起来，终于被齐国等打败，身死国亡。庄子就是在“昏上乱相”的统治下，过着“槁项黄馘”的生活。大概就因为他经历过一段使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感到非常痛苦的生活遭遇，对当时封建主相互兼并的行为，深有反感，从而走向愤世嫉俗的道路，这也是符合他的生活实际，是可以理解的。他曾在《人间世》篇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又在《在宥》篇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又在《胠箧》篇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于此可见，他的叛逆态度都是针对当时现实的黑暗面而发的。他没有提出任何一套新的或旧的理论来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幻想着一种自由解放的境界。他的这种观点，对当时的现实影响不能算大，但由于他所反对的黑暗现象，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即令在上升时期，也会出现。这就使后世具有类似他的遭遇的作家，从他的那种否定现实，追求自由的幻想中，特别是他的那种感情强烈而设想恢奇，形象优美的散文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也走上同样的道路并加以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叛逆文学的传统。溯本追源，庄子确实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以他的独具风格的优美散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庄子的文学散文表现了包含着愤慨来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显然不是一个悲观绝望、没落的奴隶主所能够具有的。高尔基对积极浪漫主义所作的说明：“企图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在人们的心中，唤醒对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决心，”（见高尔基：《我的文

学修养》)就庄子的文学散文中的浪漫主义而论,我认为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至于其中所表现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那是因为愤怒之极而又看不到出路的缘故,后世向庄子学习的叛逆作者往往也是如此。这虽是庄子文学散文中的一个弱点,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仍是它的战斗性。

嵇康和阮籍是比较明显地接受了庄子的叛逆文学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的。他们提倡自然,反对名教,而实质上则是为了反对当时司马氏的现实政权,我在拙作《略论嵇康及其作品》和《略论阮籍及其“咏怀诗”》(均收入拙作《诗词论析》中)两文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想指出:由于嵇、阮所反对的对象非常明确,由反司马氏而反司马氏所凭藉的封建政教的锋芒,也就更为落实。陶渊明也应该属于这个文学传统,不过自汉末到陶渊明期间,篡夺、动乱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而陶渊明在生活道路上又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因此,陶渊明作品中所表现的叛逆思想,似乎比较温和而平淡,但其思想感情的实质仍然是相同的。他的《桃花源记及诗》是本之于庄子“见空髑髅”的寓言而写得更为完整、优美;而另一篇《闲情赋》则以前无古人的对爱情的深入描绘,直接冲破礼教的束缚,虽没有为评论家所注意,但也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举此二例,都可以说明:这决不是维护封建政教的作家所能写得出的。

以上所举的都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一些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已经不能说小了;而到了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时代,由于讽谕文学的衰落,叛逆文学的传统则越来越焕发它的青春。这时候文学上的重要样式,已由戏剧和小说取代正宗的诗文。戏剧、小说的篇幅大,反映的社会面广,而大都是用白话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便于作细致、生动的描写。总之,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更和广大的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作者:

必须具有和广大人民接近的思想感情，熟悉人民的生活和善于学习人民的语言。这时候杰出的叛逆作家，都是出身于或没落成为下层文人，很自然地具备上述的条件，他们都能够朝下看，吸收人民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施耐庵和曹雪芹就都是如此。这就比讽谕文学的伟大作家如杜甫、白居易等有过一段或部分接近人民的生活经历还有所不同，而是更为广泛，更为深入，也就体现得更为真实。施耐庵的《水浒》是在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写成的，且不必说；关汉卿剧作中所反映的下层人民生活痛苦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乃至曹雪芹在特定题材下所反映的大观园中丫环们的生活命运，都不是缺乏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同情者所能写得出来的。他们虽然没有新的思想作为指导，在某些幻想中也脱离不了封建主义的框框，但由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来自下层人民的生活实际，和前期叛逆者只是出于本身的遭遇还是有所不同；而与此相连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大都是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可能调整和改革的，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也就更为强烈，实际上就已经起着反封建制度的巨大作用。

（四）

由于时代和个人生活道路的复杂关系，有的大作家同时具有两个传统的因素，以至于相互影响，难以处理。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我认为可以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只要分析出他们的主要倾向，也就可以作为处理的依据。如屈原，《文心雕龙》的“辨骚”篇曾拿他的作品和儒家的经典相比较，得出“三同四异”的结论。就其“四异”来说，可以说和封建的政教有一定背离的地方；而他在《离骚》中也曾表示自己的态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而自疏。”这都有近于叛逆者的思想。但屈原在他的作品里

面所反复述说抒发的，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希望能实现他的“美政”的理想。而且以宗臣的关系，坚持到死，也不改悔。因此，从总的重点来考虑应该说是高度表现了讽谕文学的目的。

又如司马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面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虽然主要是从史学的方面来评价，但和讽谕文学传统的要求亦可相通。证以《史记》叙述汉代的事情，在个别问题上，虽多所讥讽，但并没有对现实的政教全面否定，仍可看作提供统治者借鉴而寄以改革的希望。班固又在上引的同一文里面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也确实指出了司马迁的某些和当时的现实政教有相背离的地方，特别是和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方针不相符合。这说明问题是复杂的。我们从司马迁的身受宫刑，结合他的《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以及史记中的其它文字来进行考察和理解，应该说主要倾向还是属于叛逆文学传统的作家。只是因为他既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汉初以至武帝几个皇帝，还都是比较有能力，司马迁被刑后，也还曾“尊宠用事”，所以他的叛逆表现，就没有走得像庄子、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那么远，但倾向性则是相同的。又如李白，李白的思想和表现则更为复杂。极简单地，他的诗歌是最足以代表盛唐气象的。他曾以一个书生的身份受到唐玄宗的征召和赏识，做过一个时期的翰林学士，这是他终生引为光荣的事，在诗歌中经常提到。但他到长安不久，就受到来自权贵们特别是宫廷中的毁谤，被放还山，这又是他终生引为遗憾的事。他不仅从盛唐在各方面的事业上所表现的时代活力受到莫大的鼓舞；同时他

也对侵蚀盛唐气象的丑恶势力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感受。他以不能容忍和不能甘心的气概,对那些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揭发和抨击,甚至对唐玄宗也以“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来比拟讽刺,而“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就更直接地加以蔑视了。这可说是已经超越了封建文人教养的限度,而这也正是作家的性格和时代精神也即盛唐气象的生动体现。而从这点来把握,李白还应该算是属于叛逆文学传统的作家,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关于李白,我在拙作《略论李白》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见《新建设》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如上所述,这两个文学传统的作家虽然有着交错的复杂现象,但我们只要认真进行分析,找出主要的重点来,仍是可以处理得比较明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把两个文学传统的范围都扩大起来,这就是说:对现实政治仍怀着改善的理想,从而抒发作者的宏伟抱负和雄心壮志的,就都和讽谕文学的传统息息相通。事实上讽谕文学的伟大作家如上文所举的杜甫、白居易等,不是都有许多抒发个人“兼济天下”的愿望的作品吗?讽谕文学也就是他们“兼济天下”的落实部分,他们也就是通过讽谕文学的做法来实现他们兼济天下的理想的。另外,凡是对现实政治表示厌恶,从而抒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乐趣的,和叛逆文学传统也是息息相通的。事实上,从庄子、嵇康、阮籍和陶渊明的诗文中,都可以发现他们写过不少这类的作品,特别是陶渊明。因为他们既然和现实政治不能合作,而山水、田园的隐居生活的描写,正好是从侧面表示这种不合作思想感情的好题材。不过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就更加复杂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庸碌无能或存心不正的,也很少不说几句兼济天下的大话来装点门面的;而借写山水、田园的隐居生活来附庸风雅的,更是大有人在。但我们只要能从作家全部作品总的倾向出发,从大处着眼来进行